

文学类名探源

钱仓水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I
19
文学类名探源

钱仓水 著

PB L84/01

南京大学出版社

1241333

(苏)新登字第 011 号

文学类名探源

钱仓水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210008)

淮安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5 字数 18.2 千

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200 册

ISBN 7—305—02054—0/I·175

定价:4.50 元

自序：拣了芝麻当西瓜

俗话说，拣了芝麻当西瓜，意思是笑贬某些人抓不住大事物，拣了点微不足道的小玩意儿，还要洋洋自得，自吹自擂。当然，这笑贬是有道理的，西瓜与芝麻，一大一小，怎能相提并论，甚至夸大为大呢？只是不能一概而论，以为是绝对的真理：如果人人都去摘大西瓜，而没一人去拣小芝麻，那么，世界上岂不是要少了这种喷香的食品？何况，西瓜是百果之王，可芝麻却也是百谷之后，各有各的位置，谁也代替不了谁，尽可你抱你的西瓜，我拣我的芝麻。宏伟的宫殿离不开细小的砖瓦，庞大的机器缺少了螺丝钉便运转不起来，大小巨细是相互依存、各有其用的，如此才构成了丰富多彩、和谐统一的世界。

好多年来，我就一头钻进了“牛角尖”，在“螺蛳壳”里拣着一颗又一颗芝麻。开始是无意的，搞文体总得碰到类名，突然，眼睛一亮：这不是某个文体类名的最早出处吗？于是喜出望外，随手记录下来，当作是一粒珍珠，一块宝石，珍藏在记忆里和卡片上。哪知道流逝的时间给了我一个又一个机遇，“童话”、“神话”、“自由诗”、“散文诗”、“科幻小说”、“历史小说”、“话剧”、“游记”……接踵而成了我囊中之物。越有越贪，继而竟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匍伏下来，锐意搜求起“芝麻”，竟至于萌发出要把自己和别人拣到的、为数不多的“芝麻”汇总展示一下，出一个小小的“芝麻集”了。

的确，象一个孩子在海滩上拣到了形形色色、斑斓驳杂的贝

壳，象一个老人收藏了一辈子而得到了一枚最古老的钱币，我是洋洋得意的。我不仅拣到了别人没有过的，而且某些别人有了的，我却是更为早先的。例如“神话”，我问过一位著名的神话研究专家：“神话”一名，中国是何人、何时、何处首先从西方“拿来”的？答曰：不知。现在可以回答：章炳麟在1901年经修订、增补而志的《尴书》里，最早从西洋拿来了。例如“童话”，有人断定这一文体类名是“五四”之后从日本移值过来的；这话说对了一半：是从日本移值过来的；又说错了一半：1909年，由会稽两兄弟——周树人和周作人纂译的《域外小说集》里，就最早从东洋引进的。……诸如此类，作为一种发现，一种分辨，一种新见，我想谁碰到了谁都难免要洋洋得意一番的。

虽说，称名也小，然而，说小也不小。马克思说过，“理论的概念必须要由大规模积累的实际经验来完成”，又说，“一门科学提出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革命”。由实际经验而提出新见解、而完成新概念新术语，反过来，由新概念新术语而使人接受新见解、而对实际经验进行再认识、再分类，其中，新概念新术语在这链条里是何等关键的环扣！文体类名，看起来只是一个概念和术语，却也是来之不易，许许多多作品的积累，才有了如此名称，而名称一经形成，便成了一类类作品的标牌，犹如队伍的旗帜，字典的部首，商店的牌子，是进入文学百花园的一个个指路标，凡阅读、写作、批评、研究文学的，无不首先要注意及此，然后导入的。我国有了传统的诗歌、散文、小说等名称，才据此编过多少集子、作过多少研究！我国接受了悲剧和喜剧、神话和史诗、科幻小说与报告文学等外来名称，才又开拓出了一片片创作与批评的新地！不止于此，文体类名还是一门学科的出发点：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开篇即考“小说”一名之源；陈柱著《中国散文史》，开篇即考“散文”一名之始；张庚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开篇即考“戏曲”一名之初……追

本探源，不憚其小，何故？荀子云：“名定而实辨”，可见，称名虽小，实则大焉。

要说拣到了芝麻而自吹自擂，并非自我而始。昔日，王国维在论定《董西厢》为“诸宫调”时曾说：“一代文化文献之名，沉晦者且数百年，一旦考而得之，其愉快何如也”，一名之得，竟使这位老先生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更有甚者，胡适竟把一个古文字的考得，比作为天文学家在宇宙间发现了一颗星球！我想，大凡一个人钻进了“牛角尖”而钻出了点意思的时候，总是敝帚自珍的，总是拣着芝麻当西瓜的，总是要自鸣得意进而吹吹擂擂的。抱西瓜的大学问家拣到了芝麻尚且如此情态，浅薄如我者就更难免俗了。

话又说回来，芝麻毕竟是芝麻，而不是西瓜，当今要紧的还是去抱西瓜，解决国计民生大问题，解决文学研究的大问题。此詹詹小言，比之大宫阙、大机器来，虽有存在的充足权利，到底是微不足道的小玩意儿，对我，只是拾掇匪易，只是欲罢不能，只是觉得弃之可惜罢了。当初，为了一个类名不问囊中羞涩而买下一本厚书，不顾公私事务缠身而一头扎进图书堆，不计炎夏寒冬而埋头疏理……自视亦大愚矣。我老家苏南太仓人说丢西瓜拣芝麻的人：木木笃笃，懵懵懂懂，睡不象睡，醒不象醒，痴不痴，乖不乖，死脑筋，活作孽；我自认了。

在前人和时贤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自己拣着的一点点芝麻，肯定还有拣花了眼，把其它种子甚至尘埃也放进来的，望读者毋吝教言：最后，向在成书过程中给了我帮助和鼓励的裴显生教授及许霆、任天石等同志致以诚挚的谢意。

1992. 2. 7. (农历正月初四) 于淮阴师专

目次

自序：拣了芝麻当西瓜	(1)
诗歌：古老而又常青的名称	(1)
抒情诗：中国最早源起的诗体	(4)
话说“叙事诗”	(7)
史诗·诗史·咏史诗	(10)
田汉：“自由诗”的最早译名人	(13)
王国维：1906年就使用了“散文诗”	(15)
“五四”期间散文诗的多义性	(17)
散文诗的“散文”与自由诗的“自由”	(20)
试给鲁迅的《野草》辨体	(24)
闻一多：第一个使人注意“商籁”的人	(28)
格律诗·新格律诗·半格律诗	(33)
诗歌的格律是镣铐还是舞步？	(37)
自由诗“绝端的自由”吗？	(39)
诗体的“近”与“古”和“新”与“旧”	(43)
韵文：中国人的瑰宝	(47)
小说说“小”	(51)
章炳麟：1901年就拿来了“神话”	(54)
庄子：“寓言”及其理论的创始人	(56)

周氏兄弟：“童话”的最早移植者·····	(59)
童话的“话”·····	(62)
从“小”说到“短篇”和“长篇”小说·····	(64)
历史小说：一桩先结婚后登记的婚姻·····	(66)
演义和传奇·····	(70)
为报告小说辨体·····	(75)
梁启超：科幻小说的最早倡导者·····	(77)
第三和第一人称小说·····	(81)
剧本：“五四”间认可的文学类名·····	(84)
酒神颂·山羊之歌·悲剧·····	(86)
酒神颂·狂欢歌舞·喜剧·····	(88)
悲剧和喜剧：从舶来到落户·····	(91)
正剧：源于十八世纪的法国·····	(95)
歌剧的源起及其传入·····	(98)
莎翁的戏剧为诗体剧·····	(100)
戏曲及其归属·····	(103)
洪深：1928年提议使用“话剧”·····	(106)
历史剧及其应该分段称说·····	(109)
吴晗倡议：把非历史剧称为“故事剧”·····	(113)
幕及由幕的分类·····	(116)
连台本戏与折子戏·····	(118)
电影文学是剧本还是小说？·····	(121)
散文辨“散”·····	(124)
传·记·传记·传记文学·····	(130)
《阿Q正传》点到的各种传记·····	(133)
左联：引人注目地亮出了“报告文学”·····	(137)

《太白》：“科学小品”的发祥地	(141)
一瞥“小品”	(144)
杂文三义辨说	(147)
从“杂文”的名目说起	(150)
鲁迅笔下的“杂文”比喻	(152)
“游记”来历	(155)
游记与邻居以及它们的界限	(158)
“论说文”仍应占文学一席之地	(164)
记叙散文：散文与小说之间的品种	(169)
日记：古老而普通的魔盒	(174)
序跋：为求知遇而带的披挂	(177)
书信及其繁多名目产生的原因	(180)
天下文章三大类	(184)
文学四分法的约定俗成考迹	(187)
文学里有一种“半”字体	(191)
文体的命名、释名和正名	(196)
一个类名即能激起文学的千层浪	(204)
文学类名始用人及时间、出处一览	(207)

诗歌：古老而又常青的名称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家，源远流长，诗人诗篇不计其数，诗歌的名称也是又古老又常青又丰富又稳定，在一大箩筐的文体类名里是独一无二的。

据《尚书·尧典》记载，舜就说过：“诗言志，歌永言”。这舜，就是尧、舜、禹三位古帝之一，是传说中摘“禅让”的一位圣贤，是距今约四千多年前的原始社会里的人物。圣人名言，从此，“诗言志”就成了中国诗歌的最经典定义，“诗言志，歌永言”就成了“诗”与“歌”的最权威的界说，“诗歌”就成了最领先的文学类名。当然，《尧典》乃战国时儒家所托，但诗歌一名源起之早却由此透露了真实的信息。

《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它的300首作品大致产生于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到春秋中期（公元前七世纪），前后大约涉历了五百多年的漫长历史，包括了今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湖北等省广大地域的人民群众口耳流传的土风歌谣，经采集、删订、整理而成。在古代交通不便、封闭保守、语言互异的情况下，竟相互约定而共同一致称之为诗，这真是一个文体奇迹！辑录古代大教育家孔子（前551—479）言行的《论语》一书，提到“诗”的地方有十八处之多，诸如“诗三百”、“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可见诗歌这一名称，到了孔子的时代已经成为一类文学作品的习常称呼。在中国再也找不出另外一个象诗歌这样早早约定俗成、早

早普及流行的文体名称了。

古老的“诗歌”又是常青的，永葆着自己的青春。《诗经》以后又产生了卓绝一时的“楚辞”，一种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诗体；楚辞之后又产生了情味隽永的“乐府”，一种源于民间的歌辞；乐府之后又产生了质朴浑厚的“古体诗”，一种唐代以前的没有严密格律限制的诗体；古体诗之后又产生了千古绝唱的“近体诗”，一种篇章、句式、对偶、平仄、押韵等都有定规的“律诗”和“绝句”；近体诗之后又产生了活泼清新的“词”，一种句式参差错落、长短不一的诗体；词之后又产生了俚俗刚健的“曲”，一种类似词又可以衬字的更加灵活的诗体；到这些古代诗歌形式统统衰微的时候，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和语言的变迁，“五四”阶段又产生了现今的白话“新诗”。在诗歌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衍化出种种称呼：诸如谣、吟、赋、引、歌诗、诵诗、曲辞、歌辞、往体、古风、四言、五言、七言、杂言、长短句、诗余、散曲、词余、自由诗、散文诗……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其艺术形态可以开一个博物馆，就是名称也可以收罗解释编成一部大辞典，但正如孙悟空再翻跟斗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它们统统是诗，是诗的别称，诗的分支，诗的变体，诗的类别，仍在诗的范围之中。古老的“诗歌”在每个时代、包括现当代产生了这么多的名称，丰富多采，琳琅满目，这不是永葆青春？名称再多，万变不离其宗，这不是长远稳定？“诗歌”真是一个中国的宠儿，再也找不出一个文体名称象诗歌这样多姿多态并充满着永久的生命力了。

记得高尔基说过他的一个体验：他在黄昏时分的屋顶上读小说，被迷住了，曾经有好几次，惊奇得象野人似的，把书页对着光亮反复细看，以此想找出它魔力之所在。中国人对于“诗歌”也是如此，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的人给它迷住了，想方设法要猜透其中的谜底，解出其中的魔术，连“诗”这个字也不放过。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诗”早先写作“誨”，“誨”即“志”，“志”

现今写作“志”，“心”为意符，“出”为声符，诗者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故作“讠”；硬是曲里拐弯地去挖出“诗”的由来。梁代刘勰《文心雕龙》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情是喜怒哀惧爱恶欲，性是血气性格和思想认识，持人情性就是负载着人的感情和思想；硬是单刀直入地去点出“诗”的内涵。东汉郑玄在一个注里说：“诗犹承也”，承什么，承善恶；硬是不避曲解地去指明“诗”的功效。我们知道，诗歌这名词，在英语里是 Poetry，在法语里是 Poeme，都由拉丁文 Poeta 而来，是创造的意思。比较起来，中国人对“诗”字的创造就更有意蕴，字面的解释更为周详。至于诗歌怎么产生的，与音乐、舞蹈的关系怎样，包含着哪些因素，有什么特征……则探索者不知几多。“诗歌”的魔力是说不尽的，使一代一代的人神魂颠倒。

文体的其它概念就无此殊荣了。“小说”一名要到庄子（约前369—286）的时候才有，而且涵义几度变迁，才成了一类作品的商标。“散文”作品虽源起也早，但名称直到宋代的周必大（1124—1024）才提出，先与骈文相对，与韵文相对，之后又与诗歌相对，与诗歌、小说、剧本并举，是一个不断变动着的概念。“剧本”一名要到晚清、主要是“五四”阶段才通用。古代一些细小的类名，例如《尚书》里提到的“誓”、“命”、“训”、“诰”等，这些都是有了阶级、有了国家、有了史官之后才出现的名目，都比“诗歌”为晚。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的一切文学类名里，诗歌一名最悠久、最稳定、最丰富、最常青，中国之谓诗国，由这名称里也可见一般了。

情，故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礼记·礼运》：“孔子作春秋，而断绝《春秋》之《礼》。”《礼记·礼运》：“孔子作春秋，而断绝《春秋》之《礼》。”

抒情诗：中国最早源起的诗体

《礼记·礼运》：“孔子作春秋，而断绝《春秋》之《礼》。”《礼记·礼运》：“孔子作春秋，而断绝《春秋》之《礼》。”

据《尚书·尧典》记载，距今约四千多年前的一位古帝——舜就说过“诗言志”的话。当然，此说并不可靠，但“诗言志”早就被人频频提到却是事实：《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有“诗以言志”；《礼记·仲尼闲居》记录了孔子（前551—479）说过“志之所至，诗亦至焉”；《孟子·万章上》记录了孟子（前370？—289？）说过“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可见，“诗言志”在春秋战国时候已成为诗歌的统一解释。那么，什么是“志”？《毛诗序》作过一个权威的说明：“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从“情动于中”开始到“形于言”完成，因此，“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志一也”（孔颖达：《毛诗序正义》），**“志”就是思想感情，“诗言志”实际上就已指出了诗的抒情性质。**

如果说，“诗言志”是转了个弯揭示诗的抒情本质，对“诗言志”的解释还有歧义，那么，到了屈原（约前340—277）的诗里就直接了当、明白无误了：

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

——《惜诵》

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达。

——《思美人》

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

——《惜往日》

谁可与玩斯遗芳兮，长乡风而舒情。

——《远游》

屈诗中反复多次出现“抒情”（“抒”与“舒”古通，“舒情”即“抒情”），不仅为“抒情”一词的最早出处，而且与“诗”或“志”联系起来，捅开了“志”与“情”之间的字面屏障，可以说屈原是“抒情诗”一名的第一个创造者。

之后，到了建安时期，文学进入了自觉的时代，诗的抒情性质进一步得到了肯定。先是曹丕（187—226），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最早专篇《典论·论文》里指出了“诗赋欲丽”。什么是“丽”？刘勰说：“辨丽本乎情性”（《文心雕龙》），可见“丽”即情的语言形态。接着，陆机（261—303）在著名的《文赋》里进一步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这里，“绮靡”指的是语言形态，属于诗歌形式的范畴，与曹丕的“诗赋欲丽”相通；“缘情”指的是感情性质，属于诗歌内容的范畴，与屈原的“发愤以抒情”相承；也就是说，陆机是第一个完整地指出了诗歌内容与形式特征的理论家。特别是“诗缘情”揭示的诗歌本质特征，比起“诗言志”，更加明确，更加直接，在“诗言志”的“志”，受到儒家礼教的规范，被塞进一些庞杂的东西——例如“兴观群怨”、“事父事君”、“温柔敦厚”、“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思无邪”——而膨胀起来，把原先所包含在“志”里的“情”挤缩、压瘪的情况下，“诗缘情”不仅把“情”召回，而且干脆脆以“情”代“志”，在那时候是石破天惊的，由此开始，诗的本质专在抒情，再也不含糊，再也不会被扭曲了。中国从《诗经》开始的经由楚辞而至乐府的诗

歌抒情传统，从理论上确定了下来，顺流而下，唐诗、宋词、元曲乃至“五四”以来的新诗，抒情始终是诗歌的主潮。

以此与西方相比，差别是很大的。西方的诗歌是从叙事诗开始的。《伊利亚特》、《奥德赛》就是，中国的诗歌是从抒情诗开始的，《诗经》就是；西方的抒情诗要到萨福（公元前612?—?）才成气候，但是这位古希腊女诗人虽然写过很多诗，流传下来的却只有完整的两首和一些残句，中国的抒情诗从公元前11—前7世纪就十分兴旺，经孔子删订而结集的《诗经》而保留下来的有近300首（不包括其中的少数叙事诗）；西方的抒情诗有不少大家名篇，如但丁、莎士比亚、雪莱、普希金，中国的抒情诗则大家辈出、名篇纷飞，如屈原、陶潜、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辛弃疾，可谓星光灿烂；西方的“抒情诗”一名最早见于柏拉图（前427—347）的《伊安篇》，之后，独占一类，与叙事诗、戏剧鼎足而立，中国的“抒情诗”却经历了“诗言志”——“发愤以抒情”——“诗缘情”的过程，缘起极早而定名稍迟，理论却极为丰富，受到整个文学环境的制约，与散文平分天下……从这差别里可以看到中国的抒情诗是世界的一绝，无与伦比的。

话 说 “叙 事 诗”

《诗经》305篇，绝大多数是抒情诗作，可也有叙事诗的胚胎，《氓》写了一个女子的被骗和被弃，《东山》记了一个征夫的归来，《邶》、《生民》、《公刘》叙述了周代开国的历史，但是，这少数的叙事诗被淹没在抒情诗的丛林里，被忽略了。庄子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天下篇》），荀子云：“《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儒效篇》），把言事的功能完全归于散文《尚书》，固然突出了诗歌的抒情性，却也忽略了诗歌可以担负的叙事功能。这种忽略又带来了长远的影响，比如直至明代，陆时雍还断言：“叙事议论，绝非诗家所需，以叙事则伤体，以议论则弗词也”（《诗镜总论》）。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之一）吧，《诗经》之后虽出现了好些叙事佳作，《焦仲卿妻》，《木兰辞》，《长恨歌》，《琵琶行》，《圆圆曲》，《婉孌词》，但并不认为这是诗歌的本职，诗歌的本职专在抒情言志，而“叙事则伤体”，叙事是狗逮老鼠——多管闲事，由此而造成了叙事诗的凋零，不景气，甚至有人嘲讽地称它为“稀有动物”。这种情况，当中国封闭的大门被打开，欧洲的文化之风吹进之后，为许多人在中西文学的比较中敏锐地感受到，王国维不无遗憾地承认，我国的叙事诗、史诗“尚在幼稚之时代”（《文学小言》），胡适甚至说中国古代“仅有风谣与祀神歌，而没有长篇故事诗”，“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很少的现象”，并断定中国诗歌“都走了抒情与讽喻诗的路子”（《白话文学史》）。

尽管如此，叙事诗这一名称却早已包孕在好多论述中。人们在总结《诗经》的时候提出了“赋、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那么，什么是“赋”呢？汉代经学家郑玄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辞也”（《毛诗正义》《关雎》诗注），这个说法很有影响，说“铺陈”是对的，但都要与“政教”扯在一起，就偏颇了。之后，刘勰、钟嵘、孔颖达都有解释，说得比较简单明确的是宋代的朱熹：“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诗经集传》《周南·葛覃》诗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把某件事情直接陈述并展开来写，如此写出的诗不正是叙事诗吗？事实上，赋、比、兴在诗里是很难截然分割的，抒情诗固然更多地使用比、兴，可也要赋，叙事诗固然是赋，可也要运用比、兴，但是差别是存在的：比、兴只是诗歌表现的手法，而赋还可以是一种诗体——叙事诗。之后，中国出现了汉乐府，它有什么特点呢？东汉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序》里说：“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诗经》里的叙事胚胎到了乐府阶段，就发展了一步，如《陌上桑》、《东门行》、特别是《焦仲卿妻》，诗里叙事性、故事性乃至戏剧性都有了增强，“缘事而发”不仅直接包含了“叙事诗”的概念，而且也指出了汉乐府是以叙事为特征的。再后，例如白居易自述《秦中吟》的创作经过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固直歌其事”，这里的“直歌其事”与前之“直陈其事”、“敷陈其事”都是一个意思，表明了诗歌除了抒情言志之外，还有一个功能，即叙事，而这一功能是被不少人点出过的。大概受到了抒情短章的和启发和规约，在叙事诗上，中国人独标一格的是，写出了一种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叙事短章。李季《兰州诗话》里说：唐诗中有一类诗，有不少只有四句，就绘制入情地描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他并以王建《新嫁娘》：“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翁姑性，先遣小姑尝”为例说明。这真是